

内 容 提 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别具一格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为了正确认识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我们撰写了此文。

全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河湖港汊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客观条件。这些有利客观条件是：第一，有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复杂自然环境；第二，有给养丰富的经济力；第三，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河湖港汊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第一，便于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第二，能够开展一定规模的运动游击战；第三，在危急和困难中易于坚持；第四，游击战争可靠的后方基地。

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与山地、平原游击战争一样，是整个游击战争的各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开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论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

郭步云 任大立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一九九一年七月

内 容 提 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别具一格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为了正确认识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我们撰写了此文。

全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河湖港汊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客观条件。这些有利客观条件是：第一，有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复杂自然环境；第二，有给养丰富的经济力；第三，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河湖港汊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第一，便于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第二，能够开展一定规模的运动游击战；第三，在危急和困难中易于坚持；第四，游击战争可靠的后方基地。

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与山地、平原游击战争一样，是整个游击战争的各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开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论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

郭步云 任大立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以救国救民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泛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同时，还探索出在河湖港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作战经验，为游击战争的画卷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就曾提出要注意总结河湖港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但迄今为止，有关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对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洪湖水上游击队的创建，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为纪念党的生日，为说明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我们撰写此文，以奉献给党，并求教于识者。

(一)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对于这一点，人们不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河湖港汉地区是否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人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

在古今中外的游击战争史上，游击战与山地的结合似乎成了一条不变的法则。无论是中国宋代王彦领导的抗金武装，还是十八世纪高加索人开展的抗俄游击战，都是以山地为依托进行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家劫舍”的绿林大盗，也是以“绿林”为出没的去处。故恩格斯曾指出：“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①

不仅如此，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也与山地密不可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十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除了洪湖根据地外，都是以山地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挺进华北最早建立的晋察冀、晋西北、晋西、晋东南四大战略基地，也分别是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行山等山险为依托。华中新四军最早建立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也是以茅山为中心。

古往今来，山地游击战的实践，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游击战非山地莫属，只有山地能够开展游击战争，而在其他地区，包括河湖港汉地区，则不适合或不能开展游击战争。二战时期，曾任湘鄂西苏区主要负责人的邓中夏同志，就认为洪湖水网区，大部队活动不开，力主依靠山地而反对部队返回洪湖的正确主张，致使红二军团受到了重大损失。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同志，也强调在华中平原水网区，部队行动困难，犹豫迟疑，丧失了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最有利时机。

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河湖港汉地区是否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又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正确认识河湖港汉游击战争历史地位的一把钥匙。

对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结合井冈山

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作过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除了要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等主观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很好的群众，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等客观条件。②

河湖港汊地区不仅基本具备以上客观条件，而且在某些方面较山地、平原为优，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具体表现是：

一、有便于游击的复杂自然环境

从地理条件来看，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凭借一定的自然环境，以有利的地形作掩护。因为进行游击战的一方，力量比敌人弱小，故更必须凭借有利的地形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在可以凭借的有利地形中，具有崇山峻岭之险的山地无疑是很理想的。因为“对寻求掩护者来说，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象在山地那样到处可以找到这样有效的地形障碍。”③河湖港汊地区虽然没有这样的地势，不能象山地那样相对容易地开展大规模的部队运动，但水乡复杂的自然环境极便于游击队的出没和周旋。

河湖港汊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河湖纵横交错，到处都是堤坑、沟渠、墩台、浅滩，且随水涨水落，变化多端。在一些湖沼地带，包括象洪泽湖、洪湖等大型湖泊的浅水区，积满淤泥，人畜掉下去，会越陷越深。行路必须借助船只，叫做“无船不走路”。但湖中水道，纵横交错，九曲回肠，就象一幅八卦图，并不好走。船只行驶，只能从几条口岸沿着数丈宽的水道走。每条主干道又分出无数条小叉道，可行小船。汽船、舰艇开进去，很容易被水草蒿排绞住舵桨，动弹不得。游击队员只要一挺机枪或几条鸭枪，就能封锁住一条水道，让敌人寸步难行。

这种复杂的地形，不便于大兵团作战，从而限制了游击队活动的规模。但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一矛盾关系来看，实际上更不利于敌人，而有利于游击战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在复杂的地形中难于施展，有劲使不出，其优势兵力也容易被河湖港汊分割开来，被迫形成多股出击的局面，从而造成有利于游击队机动袭击、各个歼灭的空档。人数较少、装备较差的游击队，则可利用复杂的自然环境，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从而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

河湖港汊地区不仅便于迂回游击，而且易躲能藏，便于隐蔽。在广大的沼泽地带及湖岸周围，往往长有大片的芦苇和蒿草，宽约数里、几十里，浩浩荡荡，一望无际。机枪子弹在芦苇中穿行，五十米开外就成强弩之末。接近内湖，则是大片的荷丛及鸡头米之类的水生植物。民歌形容荷叶的茂密说：“荷叶林，荷叶林，荷叶底下能藏人”。人畜进去，顿消得无影无踪。正是由于湖沼地带的这一特点，故历史上常常是绿林水寇经常出入的地方。游击队一旦形势不利，便可迅速撤退到漫漫湖荡之中，让敌人望湖兴叹，无可奈何。洪湖赤卫队的一首歌谣，形象反映了这种情形：“老子本性天，住在洪湖边，要想捉老子，除非是神仙。”

河湖港汊地区的这种地势，受到了长期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人的赞许。为开辟洪湖苏区立下汗马功劳的周逸群同志，最初曾担心在没有高山掩护的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但经过实践的检验，使他明确地指出：“洪湖地势之好，可以实行‘跑兵’政策”（指便于迂回游击）。④领导创建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李先念同志，也在1943年总结斗争经验时说：“我活动地区除山地外，还有湖泊，日寇之特种兵无法发挥作用，如以步兵运动，则比不上我们迅速、机动。我活动余地大，可免受敌袭击。”⑤

二、有给养丰富的经济力

从经济条件来看，开展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一定的后勤保障，能够基本解决游击部队的吃饭穿衣。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终究比较贫穷困苦，人口稀少，给养和兵力都有困难，往往需要其他富庶地区的支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曾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山地的依靠无法支持平原，没有平原的财力无法养活山地。”^⑥道出了山地对其他地区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而河湖港汊地区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具有比较充分的经济保障。

河湖港汊地区，大多是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平原水网区，既有舟楫之利，又有肥沃的土地，衣食问题较容易得到解决，从而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在这方面，河湖港汊地区远较山地为优，且毫不逊色于一般的平原。江浙的太湖地区，是发达的农业区，盛产粮食、棉花、蚕丝等作物，号称“苏湖熟，天下足”。河湖交织的淮河地区，古代有“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的说法。湖北的洪湖地区，更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湖区各县，每年有大量的粮食及棉花出口，就是稍有水旱灾害，也自给有余。附近的河南、湖南、江西及贵州等地的穿衣，多仰仗这一地区。

除了盛产各种农作物及经济作物外，河湖港汊地区还有大量的水产资源，这是这一地区的又一经济优势。太湖、洪泽湖、洪湖等水乡，既有鱼虾、螃蟹、野鸭、大雁等美味佳肴，也有莲藕、菱角、芡实、菰、苦菜等水生植物。“撒网就是鱼，扬锄就是藕”。抗战时期襄南抗日根据地的歌谣说：“洪湖水，甜如蜜，洪湖水有利息，东湖菱角，西湖藕，南湖蒿草，北湖鱼，只要勤劳不偷懒，人人都能有饭吃”。住在湖边河岸的农户，不少是以打鱼为生，以船为家。洪湖地区的监利、沔阳、江陵、汉川等县，渔业特别发达。据三十年代统计，仅以洪湖计算，每年可得渔利两百万元左右，收入排在稻、麦的前面，位居榜首。

此外，河湖港汊地区水系相通，水上交通发达，商船往来如梭，沿岸码头、商埠特别多，商贾云集，各业繁荣，就地设卡收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河湖港汊地区的上述经济优势，只要能很好地运用，就能不困难地解决物资供给问题，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敌人严厉经济封锁、层层围剿的情况下，游击队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三、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从政治条件来看，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游击战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障。徐向前同志在《开垦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明确指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帮助”。^⑦河湖港汊地区的群众基础，与山地、平原一样，都是好的，但河湖港汊地区的阶级矛盾更为激烈和尖锐。

河湖港汊地区的农渔民，深受地主、湖霸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艰难。湖北的洪湖地区，绝大多数良田、湖水为少数地主、湖霸控制。沔阳保丰垸的五万亩芦苇湖面，三家大姓占去了其中的百分之七十，而周围的五百五十户农渔民，仅占百分之三十的湖面。襄北的刁汊湖一带，湖地的十分之八九为几家地主占有。天门的渔场水面，百分之八十为湖霸占有。故当地的民谣形容说：“土豪湖霸两重天，压得穷人气难喘，久了田租无田种，迟交了鱼款要夺船”。在河北的白洋淀，少数欺压百姓的地头蛇，逼得农渔民家破人亡，人民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来表达他们对几家大姓的畏惧和仇恨：“陈不惹，韩不沾，惹得刘家就见

官。”就是号称富甲江东的苏南水乡，据抗战前的调查，也有一半人家是负债的，大多数家庭困苦不堪，所谓富庶者只有少数地主，而不是一般劳苦群众。

水网地区的群众还常为水旱灾害所苦。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由于堤岸常年失修，水灾频繁，“十年九水”。淮河流域、荆江两岸及白洋淀地区，都是水灾经常肆虐的地方。仅1931年洪湖地区的水灾，就使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天灾人祸，使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群众被“逼上梁山”，起来反抗。淮河两岸的群众，在地主水寇的压迫下，养成了刚烈强劲、富于反抗的性格，人称“淮上健儿”。洪泽湖上的打渔群众，为了自求生存，自发结成组织严密的“鹰帮”、“枪帮”，凭借着神奇的枪法，在湖中飘忽闪烁。洪湖岸边的农民，既长于泅水，也练习拳术，并不时在湖中惩办地主劣绅，人称“翻蛋子”。这就为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专门从事战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根据地的选择，要考虑地理、经济、政治等条件。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主要选择地形复杂、便于隐蔽和固守的山地，其次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有好群众基础的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区。”^④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其中也肯定了河湖港汊地区。

(二)

浩浩荡荡的芦林草荡，曾孕育过无数水中豪杰。早在一千年前的宋代，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和张瑄领导的抗金武装，就是以水泊梁山为活动舞台的。但是，以河湖港汊为依托的武装斗争，只有得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会闪耀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土通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北境内的河湖港汊地带——洪湖地区，贺龙、周逸群同志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及著名的洪湖赤卫队，在当时不少起义部队走向边界山道、以山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利用河湖港汊的有利自然环境，展开了历史上梁山泊英雄好汉所无法比拟的湖区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以河湖港汊为主要基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并使湘鄂西苏区成为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鼎足而立的三大苏区之一，赋予了游击战争以新的内涵。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活跃于大江南北的人民革命武装，纵横驰骋于江河湖海，建立了更多的以河湖港汊为依托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重现了河湖港汊游击战争多姿多彩的壮丽画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河北的白洋淀，山东的微山湖，湖北的洪湖、刁汊湖，安徽的巢湖、瓦埠湖，江皖的洪泽湖，江浙的太湖，以及沿江沿海的广大地区，到处飘扬起人民革命战争的旗帜。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少是在水网地区，就是华中最早建立的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和以大悟山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根据地，也包含有大片的水网游击区域，前者有太湖等著名游击区，后者有天汉、鄂东沿江和襄南等水网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实践说明，在河湖港汊地区开展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是一定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事实表明，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无论是山区、平原，还是河湖港汊地区，都一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只是由于各自的客观条件不尽相同，开展游击战争具有不同的特点罢了。同山地和平原相比，河湖港汊游击战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便于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

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决定了进行游击战的一方，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与敌人斗勇斗智，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河湖港汉复杂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正便于游击队以多种武器、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充分显示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河湖港汉地区沟渠纵横，水陆交织，又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为游击战士水上、陆上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游击战士可以利用河湖港汉的复杂地形，战斗在碧波荡漾的湖泊中，水陆交替的变幻中。或黑夜伏击，偷袭敌营；或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或里应外合，突然袭击；或芦苇设伏，诱敌深入；或深入虎穴，智取敌军。以变化多端、不拘一格的斗争形式，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让不熟悉复杂地形的敌人处处被动挨打、防不胜防。

二战时期，洪湖苏区的军民，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以众多的湖泊为依托，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以夜袭、伏击、白刃战、围困、骚扰等多种战法，多次化险为夷，粉碎敌人的进攻，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在1931年4月的余家埠伏击战中，段德昌指挥的红三军独立团，利用余家埠附近的河、湖、港、汉兼有的复杂地形，在一条与湖相连的堤坡上巧妙设伏，全歼入侵苏区的敌一个团的兵力。被歼的敌人中，有500多人是被逼进湖中淹死的。在1931年9月的牌洲渡江袭击战中，沔阳、川阳游击队及群众两千余人，乘坐几百只木划，成功地渡江夜袭距根据地较远的、敌重兵设防的牌洲镇，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缓解了苏区的经济困难。

生活在水网地区的农民，或为渔民，或为猎手，风里来、雨里去，熟悉水性地势，具有高超的游泳泅水本领和驾船技术。主要由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渔民组成的游击队，擅长使用各种捕鱼打雁的生产工具与敌作战，充分发挥各种土制武器的作用。他们使用的武器，除了大刀、长矛、钢叉、梭镖以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弹药外，还有鱼叉、鱼钩、鱼网、鱼船、土銃、抬枪等等。一些游击队还匠心独具，将一些生产工具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些具有鲜明水乡特点的战法，让敌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垛划子”和“钢板划子”就是湖区军民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

“垛划子”是洪湖地区的一种水上打鸭和采莲的工具，平底，有头无尾，只有普通船只的一半长。这种垛划子不便在大湖上行走，却极适于在淤泥和蒿草中滑行。游击队员将垛划子的前面和两侧堆放上用泥巴蒿草做成的掩体，借以掩护自己，打击敌人。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土坦克”。“土坦克”体无寸铁，却威力无比。洪湖赤卫队多次运用这种武器战斗在草丛滩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

与“垛划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钢板划子”，是洪泽湖上一种体长头尖、速度快的船只。在这种船的船头放置一块钢板作掩体，就成了“钢板划子”。钢板划子不能生效于密丛丛的芦苇滩里，却能驰骋于碧波汹涌的湖面上，顺风顺水，其势如飞。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洪泽湖水上大队，就是利用钢板划子，活跃在洪泽湖上，控制了大部分湖面，使洪泽湖成为打击敌人、掩护自己、运送物资的有效场所。

二、能够开展一定规模的运动游击战

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化成为必要。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最后打败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就提出了河湖港汉游击战争的规模问题，即能否开展一定规模的主力作战。

的确，同崇山峻岭相比，河湖交织的河湖港汉地区，不适宜大兵团作战，从而制约了游

击战争的规模，同时，由于河湖港汊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敌人可以利用公路、河流快速调动优势兵力，围剿游击队，这就给运动战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而使河湖港汊地区的作战，一般都是游击战。

但是，任如事物都充满辩证法。河湖港汊复杂的地形虽不便于大兵团作战，但却为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地形上的便利条件。敌人的围剿部队虽然有十万之众，但容易被河湖港汊分割开来，尾大不掉，行动不便，难于互相接应。具体到每次战斗、战役来说，兵力却相对减弱，从而将优势转化为劣势，造成了游击队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为游击队机动灵活的转移、集结兵力，开展一定规模的运动游击战提供了可能。

二战时期的洪湖苏区，就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带运动性的游击战。如新沟嘴之战中，敌军三万余人，乘红军主力正在襄北作战之际，兵分三路，向苏区中心区推进，企图一举歼灭湘鄂西首脑机关。当时留在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兵力只有一个营左右，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正在襄北作战的红三军七、九两个师，在总指挥贺龙的指挥下火速回师救援，在运动中阻止敌人，保卫苏区。红七师从荆南方面出击敌之侧背，红九师两个团在段德昌率领下昼夜兼程，抢在敌人之前隐蔽地赶到新沟嘴构筑工事，以逸待劳，变不利为有利，全歼入侵苏区的三个团的敌军，生俘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打伤敌师长，其余两路敌军也被迫不战而退。

在河湖港汊地区主力对主力的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总体上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大部队的行动无论是军需供应，还是交通运输等方面都会有许多困难。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游击战，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战斗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巧妙地捕捉战机，适时地组织战斗，从而赢得战斗的主动权。在战斗中，必须根据敌势、我势、地势等情况，采取适当的作战形式和机动灵活的战法，切忌死打硬拼和被动呆板，精心地安排和组织隐蔽、转移、集中、开进、进攻、防御和撤退，并根据战斗的发展变化灵活地使用和转变战术。此外，还必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坚决依靠群众。否则，运动游击战的开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三、在危急困难中易于坚持

河湖港汊地区虽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险隘，难以象井冈山那般“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但它却有自己的优势便于游击战争的坚持。这就是河湖港汊地区广阔的水面、漫无边际的芦苇以及丰富的水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游击队能够在危急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

洪湖苏区的军民，曾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粉碎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坚持并发展了根据地。当时，敌人进攻苏区的兵力在三万人以上，并配合有大量团防武装，气势汹汹。而我方的兵力，由于主力部队和大量地方武装远离苏区而严重不足，整个苏区只留三百来地方武装，好坏八十多条枪。幸好不久从前线回来的伤病员和战斗中失散的人员有一千余人，组成了一支百千力量，人称新六军。洪湖苏区就靠这点本钱，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利用湖区回旋余地大、湖泊多的自然环境，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或内线作战，隐蔽到洪湖、白露湖、三湖等湖心深处坚持斗争；或外线作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洞庭湖、刁汊湖一带，乘机打击敌人。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恢复了根据地，而且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新六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各地地方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并新开辟了洞庭特区。

解放战争时期，淮北解放区的广大地区曾于1946年11月沦于敌手，只有洪泽湖上的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当时，淮北分区的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都已撤走，来不及撤退的一部分基层后方机关和九个县的地方干部、武装人员及家属共约三千多人，被迫转移到洪泽湖上。这批转移到洪泽湖上的军民，在强敌包围、饥寒交迫、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中共洪泽湖工委和对敌斗争指挥部，将非战斗人员精简，把春县的地方武装编成两个连、五个武工队，凭借广阔的水面和大小船只，在湖上坚持斗争，多次打退敌人的围剿。粮食困难，就挖藕、捕野鸭、挖菱角充饥。留在湖中的五百多人，经过五十八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胜利地与重返淮北的主力部队重新会合，保持了这块淮北唯一的红色基地，使日后恢复和重建淮北解放区有了可靠的基础。

河湖港汊地区易于坚持的情况，还可以从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活动中得到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在津浦铁路线的枣庄、临城一带，活跃着一支机智勇敢的铁道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为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阻止敌人的进攻，专门破坏敌人的通讯和铁路，制造事故，拦截敌人火车和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就是这支吃“两条线”的游击队，在敌伪加强对临城、枣庄的扫荡，妄图消灭铁道游击队的困难局面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及时转移到微山湖一带，以微山湖为依托，在津浦铁路线两侧继续进行斗争。由于有了一个易于迅速转移和隐蔽的湖泊作后盾，铁道游击队不仅在敌伪的扫荡中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打开了局面。

四、游击战争可靠的后方基地

游击战争的坚持，还必须要有比较牢固的后方基地，以解除后顾之忧。山区的后方基地可做到安然无恙，但有粮食匮乏之虞；平原的后方基地得以丰衣足食，却又隐蔽性不足。而河湖港汊地区，既易于隐蔽，便于转移，又是鱼米之乡，经济上便于补给，从而使河湖港汊敌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更胜一筹。

抗战时期，位于鄂东黄冈境内的涨渡湖抗日根据地，西临日寇重兵盘踞的武汉，且处于敌占区和顽占区的接头部位，由于有芦苇丛生、经济资源丰富的涨渡湖作依托，一度是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后方基地。鄂豫边区的许多后勤服务机关，如被服厂、毛巾厂、电池厂、修械所、边区建设银行、第三印钞厂、税务总局、党校、干训班等，自1941年起，先后迁驻到涨渡湖根据地。其中被服厂可月产军服三千多套，直接由五师后勤部调拨使用，供给十四旅全部、十三旅一部及部分地方人员。十四旅野战医院下辖三个医务所，急需时可收治七百多伤病员。由于这些后勤服务机关设在湖心墩台或面朝湖河的地方，又配备有急用的船只，敌情紧张时，可以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故很少发生遭受重大损失的事故。设在涨渡湖区的后勤机关，如比较难转移的野战医院和被服厂，就从未受到过敌人袭击的损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还巧妙地利用水乡的舟楫之利，将一些后勤服务机关直接设在流动的船上，创造出水上商店、水上印刷厂和水上医院等水上杰作，充分显示出河湖港汊后方基地的鲜明水乡特点。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的心脏地区苏常太一带，人民抗日武装利用江南水乡河滨交错、易于隐蔽的特点，建起了设在船上的水上印刷厂——《江南社》，负责编辑、出版和发行《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这个经常流动在阳澄湖到长江边的水上印刷厂，把机器、铅字等装置在船上，在船上拣字排字，拼好版子，然后送到岸上印刷、发行，一有情况，就迅速乘船流动。这个水上印刷厂，最盛时拥有十一条船，六、七十人，编辑的

《大众报》，发行量从三千、五千增至一万。与此前后，在苏州、常熟、阳澄湖的水网地带，还活动有一个设在船上的水上医院——江南抗日义勇军后方医院，医务人员平常在岸边工作，紧急时上船转移，过着水陆两栖生活。

至于河湖港汊地区对游击战争经济上的意义，以抗战时期的鄂豫边区最为典型。鄂豫边区处于敌伪顽的夹缝之中，长期孤悬敌后，很少得到其他地区的财力支援，物资供给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起初，它主要依靠应城盐膏矿的款项，解决边区的部分给养。不久，随着边区的扩大和部队的增加，以及战争环境的恶化，仅靠应城盐膏矿的款项，已难以解决边区的给养问题。就在这时，以刁汊湖为中心的天汉根据地的开辟，成为鄂豫边区后起的一大财源基地。至1941年，边区的主要财源，就由应城的盐膏矿的收入，转为天汉湖区的税款。1943年以后，由于襄南和石公华等水网根据地的创立，襄南地区的税收超过天汉跃居首位，与天汉湖区一起，成为鄂豫边区的主要财源基地。1944年，边区全年的四亿元关税收入中，其中三分之二是来自襄南和天汉湖区，边区全年的六十多万石田赋收入中，这两个地区占了三十多万石。据统计，鄂豫边区的财政来源、粮食供给及其他重要物资，百分之七十是由非边区主体部分的湖区根据地提供的，而边区的财政收入中，绝大部分又是来自沿河沿湖设置的税卡。这充分证明了湖区根据地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

河湖港汊游击战争的光辉实践，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构成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寇’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⑨。并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⑩将河湖港汊游击战争提高到与山地、平原游击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研究河湖港汊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这对完整的理解根据地创建的理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整体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抛砖引玉，渴望识者不吝示教。

注释：①恩格斯《山地战的今夕》、《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34页；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页；

③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57页；

④周逸群《鄂西农村工作报告》，参见《湘鄂西丰碑》第91页；

⑤李先念《一九四三年鄂豫边区的斗争》、《李先念文选》第54页；

⑥《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5册第190页；

⑦《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第136页；

⑧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编写组《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6期合刊；

⑨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90页；第388页。